

青岛是一座年轻的城市,加之与“五四运动”极为特殊的关联,又被称为“青春之岛”。百余年来,青岛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,一步步发展成了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现代化、国际化大城市。

破解这座城市成长的密码,可以有多种视角,亦可以有多种路径,从富有城市特质的建筑入手,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视角与路径。同济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聂惠哲新作《青岛里院——一种城市基因的发现》,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,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考、新的启发,势必推动人们对青岛城市变迁史的认知更上一层楼。

据统计,里院,最鼎盛时期,在青岛达到六百余座,数量不可谓不多。然而,长期以来,与里院相关的研究成果却屈指可数,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。在这种背景之下,聂惠哲的这本新作愈发显得弥足珍贵。这本书,属于相关档案编研的成果之一。基于三十余个全宗、4万件馆藏档案,进行披沙拣金式的研究,那种青灯黄卷、孜孜以求的钻研场景,可以想见,令人肃然起敬。

以往对里院是研究,一直处于浮于表面、拘于形态的状态,主要表现在建筑学意义上的研究压倒一切,热衷于冷冰冰的“物”的考证,却忽略了对穿梭在其中的活生生的“人”的挖掘,更具生命力的“人”的缺席和失语,让里院本该拥有的色彩斑斓的人文历史内涵流失于无形,这种研究视域的偏狭制约了城市史研究水平的提升。新年伊始,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本青岛史研究新作,一改往昔里院研究的沉闷、僵硬、机械、死板,开始将与里院有关的“人”的元素纳入研究视野,诸如里院的业主、经租人、租户、市政官员、建筑师以及院丁、杂役、清道夫等,在作者栩栩如生的描述中,从尘封已久的档案中走了出来,从沉默不语的状态中走了出来,仿佛变成了能开口说话、能展现喜怒哀乐的“人”。这正是这本书的功力之所在、魅力之所在、价值之所在。毕竟,舍弃了对历史场景中“人”的关注和复盘的研究,是隔靴搔痒、言不及义的简单勾勒,而不是直击要害、触及灵魂的倾情描摹。

透过这本书,我们可以管中窥豹,一窥隐身于里院建筑之中、湮没于历史风云之中的一个个很有戏剧色彩的小人物。他们的出场,让我们触摸到这座城市曾经的温情脉脉、烟火气息,也让我们切身体验了这座城市渐行渐远的刀光剑影、险象环生。

比如,1930年至1931年,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起有史以来第一次里院调查,写出翔实调查报告的社会局办事员李肇元,给了人们对青岛里院基本状况、人际关系、居民构成、风土人情直观而清晰的认知。又比如,1933年姜子先之死牵扯出来的中映医院院长、韩国人金允湜与青岛地方司法当局之间的纠缠与博弈,折射出当时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和1922年青岛回归后继续在青岛保持影响力的历史大背景。这种历史书写,适应了当下“小历史与大历史对话”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研究趋势,走在了学术研究的前列,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。

与北京的四合院、上海的里弄乃至福建永定等地的土楼一样,里院是具有青岛地方特色的建筑形态,值得珍视。里院作为商住两用、绵延颇久的特色建筑,见证了青岛风雨沧桑的历史演进过程,称之为城市发展的“活化石”并不为过,称之为时光凝聚成的“复杂巨系统”也有道理。所谓“活化石”,是指里院穿透岁月,物是人非,“物”——建筑的物理形态,很多一直存活到了今天,在城市更新步伐日益加快的当下修葺一新,成为青岛文旅网红打卡地之一,青岛引以为傲的城市地标也因此增添了崭新的成员、元素和内容;所谓“复杂巨系统”,是指里院功能多元,涵盖丰富,举凡城市规划、建筑设计、美学追求、房屋形态、历史脉络、掌故旧闻、人文特质、生态环境、生活图景,举凡城市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司法、民俗,均有不同程度的映照、投射、聚集和展现,成为认识和体味青岛这座城市不可多得的切入点。

里院之于青岛,到底意味着什么?青岛之于中国,到底意味着什么?里院的研究,需要纳入青岛整体的研究框架之中、作为青岛整个城市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。同样,青岛的研究,也亟待纳入中国整体的历史进程之中、追随全国乃至世界最新的学术研究步伐,同频共振,相得益彰,不能孤芳自赏囿于一隅、故步自封独立运作。在这方面,需要寻标和对表,需要找寻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参照系,唯其如此,才能实现从量到质的跨越式发展,这是青岛史研究在新时代语境之下高品质、高水平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
《青岛里院》展现了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历史书写与表达方式。字里行间,流露出作者对小人物的尊重、对在苦难中挣扎的底层民众的悲悯,从而赋予了这本书应有的人文高度与历史价值,值得充分肯定。

**作者简介:**陆安,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二级教授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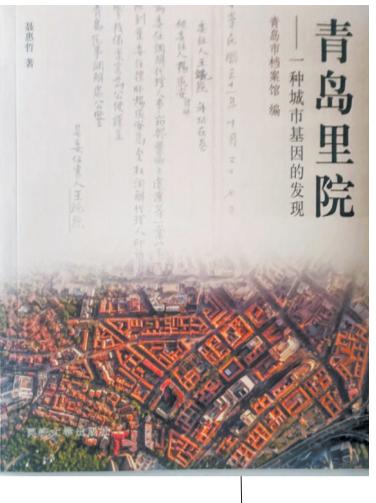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
zaobaofukan@126.com
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  
青岛」  
扫描关注



## 《青岛里院》:找寻一城烟火气

◆ 陆安

## 《射雕英雄传·侠之大者》的叙事之魅

◆ 王珉



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堪称丰碑。此次由徐克执导、肖战和庄达菲领衔主演的电影《射雕英雄传·侠之大者》还原原著《射雕英雄传》第三十四到第四十回的武打戏,以少年群像叙事突破传统模板,以视觉奇观抵消武打戏退化的窘境,成就“侠之大者为国为民”的少年感侠义正义。

《射雕英雄传》原著刻画少年郭靖的成长史,电影《射雕英雄传·侠之大者》不仅还原少年郭靖的成长,也描绘出一个复杂的江湖世界。电影的兵种涵盖重甲骑兵、弓骑兵、轻骑兵、大盾兵、圆盾兵、长矛兵、重步兵、草原大军、大宋军队、丐帮义军等等。一方面,金国骑兵身穿铁浮屠,手持狼牙棒,战斗场面写实,极具视觉震撼性。与原著小说第一章的描述吻合。另一方面,草原弓骑兵迅猛凌厉,阵型多变,灵活穿插,让观众想到金庸善用宏大意象渲染草原骑兵的磅礴气势。原著写道:“轻骑如风掠阵,重甲似山崩摧。”通过“风”与“山”的对比,暗示蒙古军队刚柔并济的战术哲学。

该片类似玄幻剧仙侠剧的武打戏,远超自然规律的特效,还原出原著武打戏的精彩。原著通过三类文学手法让降龙十八掌“显形”:一是自然现象比喻,掌风如“狂潮怒涛”,郭靖掌力激得松树“针叶纷落如雨”。二是生物动态拟态,洪七公教授“神龙摆尾”时强调“这一招须得反手打出,腰间使力,如神龙掉尾”,以龙尾横扫的动态赋予招式形态。三是内劲流动描写,郭靖运劲时“丹田中一股热气分从双臂贯到掌心”,以内力运行轨迹替代外形。在电影里,原著的降龙十八掌,不是简单的招式堆砌,而是将掌风化为半透明气劲,以扭曲的空气为意象,掀起沙暴、震碎地面、击破石碑,掌掌都是原著武打戏的具象呈现。

除了降龙十八掌,导演徐克还将原著那些模棱两可的招数,也具象化呈现:《九阴真经》和蛤蟆功等武功绝学的视觉化呈现;“时乘六龙”多道气劲的飞行轨迹;令人震惊的“隔山打牛”;黄蓉打狗棒与华筝弯月刀对阵;改动细化《武穆遗书》原著武打戏的阵法等等。徐克的新尝试在于增加武打戏的神奇能力——武功、兵器、阵法。既保留原著武打戏的武侠元素,也通过特效在视觉上达到与玄幻仙侠剧相媲美的效果,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武打戏体验。

《射雕英雄传·侠之大者》承接《射雕英雄传》第三十四回,江南七怪中的六位在桃花岛离奇死亡,郭靖和黄蓉分道扬镳。郭靖寻黄蓉误入蒙古战场,巧遇义兄蒙古四王子拖雷。此时,蒙古、金国、大宋三方势力犬牙交错,刀光剑影,生灵涂炭。电影试图为原著注入少年感:以郭靖、黄蓉、华筝、拖雷凸显少年的意志、雄心以及对身边人的守护。他们的侠义正义之心与能力大小无关,而是存在于每个人心里的侠客精神。

电影中的少年郭靖,处于身份困境的撕扯之中。他是大宋忠良之后,又被母亲带到草原抚养长大,更被蒙古大汗指定为“金刀驸马”,他与蒙古四王子拖雷义结金兰。这让该片不仅有宏大厚重的形态,也体现出少年感灵动活泼的一面,更有少年的成长经历和审美体验。一边是忠肝义胆的爹,深明大义的娘,至死不渝的黄蓉;一边是有知遇之恩的蒙古大汗,青梅竹马的公主华筝和情同手足的义兄蒙古四王子拖雷。郭靖该如何抉择?片末,黄蓉提醒郭靖,蒙古四王子拖雷和蒙古大汗都在大宋城关对面,郭靖认为只有抓住蒙古大汗才能保住大宋百姓。具有少年感的郭靖,选择挣脱身份的囚笼,向侠义正义的江湖靠近。

由此,观众可以窥见少年郭靖如何在混乱割裂的世道中践行侠义匡扶正义,又不以牺牲弱小者为代价。该片的少年感为传统武侠电影注入新鲜血液,少年侠客的成长不仅体现在武功提升,更在于内心的成熟、价值观的塑造以及对侠义正义的追求。

徐克塑造少年郭靖的“不忍”,侠义正义的慈悲心,让他不能坐视不管大宋子民。为阻止蒙古企图借道南宋以便伐金带来的生灵涂炭,他不惜逆势而行,在宋蒙战争背景下成为南宋城关襄阳的重要守护者。郭靖明白“侠之大者”的真谛:武功高强的人未必有怜悯之心,而武功低的人未必就不能行侠仗义。后来,郭靖和黄蓉镇守大宋边关三十五年,侠义正义跃然银幕。

郭靖生于靖康之耻,死于大宋城破。他和金庸笔下的令狐冲、段誉、杨过等性格各异的豪杰一样,他们的共性就是侠义正义。少年郭靖驾马车带死去的娘回中原将其葬在雁门关,他在娘的墓前说的那番话彰显了侠义正义的慈悲心。

《射雕英雄传·侠之大者》将江湖中的幻梦、奇遇、荡气回肠与酣畅淋漓融入少年郭靖的命运,让他真正成为侠义正义感爆棚的永恒英雄。少年感的郭靖和黄蓉,正是作家金庸和导演徐克所推崇的武侠精神的具象表现。他们的善良,他们的勇敢,他们的奋斗,他们的舍生取义,直达观众内心,属于中国式侠义英雄。

徐克始终坚定地和观众站在一起,所谓“侠之大者为国为民”,比起江湖的刀光剑影、各方势力的你争我斗,天下的和平、百姓的安宁,为民除害守护正义的侠义精神,才是侠的真正追求。

**作者简介:**王珉,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,厦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